

《防空歌》里的赣南儿女抗战记

□李春媚

抗战时期,赣州各地的上空时常响起刺耳的警报声,日军的飞机频繁轰炸,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灾难。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中,一首《防空歌》在赣州的大街小巷广为传唱:“日空袭,夜空袭,时时刻刻遭空袭。为了生存起抗战,万事莫如防空急……”这首质朴的歌曲,生动反映了当时赣南人民的艰难处境和顽强抗争精神,是他们在战火中坚守家园、奋起抗战的有力呐喊,在赣州这片土地上的抗战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七七事变之后,为适应战时所需,赣县(今赣州市中心城区)在原设立防空情报站的基础上成立了防空指挥部,领导各县防空事务。各县也相应地成立了防空所,主要负责本县防空宣传、经费征集、工事构筑、人员隐蔽、伤员救护等防空事宜。

防空指挥部成立后,开始着手防空宣传和防空准备。1937年8月,赣州城首次举行防空演习。当局公告市民在空地修筑防空洞,但既无防空具体措施,又不进行检查督促,更无资金支持,公告成为一纸空文,赣州城防空几乎是“空防”。

然而,空中的威胁离得并不遥远。1938年5月,日军飞机突然飞临赣州上空,9架飞机轰炸赣州南郊的机场,炸死炸伤数十人。此后,日军飞机轰炸赣州的频率越来越高,除赣州城之外,龙南、瑞金、信丰、于都等地都惨遭轰炸,很多工厂、民居、商店被炸毁,众多无辜平民死伤。

鉴于防空形势日趋严峻,同年5月,赣县防空指挥部改组为防空司令部,内设行政科、情报科、防护科、宣传科、会统室及通讯班等,主要实施对空隐蔽、防护和消除空袭后果,尽量把敌人空袭造成的损害降到最低,有效地保存人力、物力资源,以期迅速恢复作战力量和正常生活秩序。譬如,在各地设有防空监视哨,监视敌机活动情况,及时用电话上报和传递互报;在天竺山山顶设置电笛,规定了报警信号;在天竺山山腰修筑了一个宽阔坚固的防空洞,派员驻防守卫。另外,赣县各界联合组织了一个防空防护团,下设通讯大队、消防大队、工务大队、救护大队,由各行各业派人参加,分工负责。

同时,赣州城也开始防空演习。防空司令部制定了《防空演习须知》,散发给全市居民及防空部队等,并张贴于交通要道,广为宣传。《须知》要点如下:空袭警报响起,全市人民立即疏散至防空设施等安全区域;紧急警报响起,交通管制切断交通,禁止市民自由活动,除防空任务车辆外,其他车辆停驶。夜间,灯火管制队检查灯火遮蔽情况;敌机飞离后,解除警报,恢复日常秩序。

1940年11月21日,赣县举行了庆祝首届防空节的活动,民众对防空演习的参与热情也推向了高潮。活动当天,不仅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还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的参与。同时,防空“献金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市民慷慨解囊,青壮年们更是热血沸腾,纷纷立志参军,投身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中。赣州城先后有近200名青年学生毅然决然地放下书本,告别校园,奔赴战场。在沙石镇沙石村,73岁的李大爷更是做出了令人敬佩的壮举。他毫不犹豫地送四个儿子走向战场,杀敌报国。面对日军的侵袭,赣州人民团结一心、无私奉献,誓要将敌寇从自己的家园里赶出去。

在强化防空人员培训并充实人员力量的同时,防空洞建设力度也得到了显著提升。据史料记载,在民众的广泛配合下,赣州城各地共修建了近5万个大小不一、新旧各异的防空洞。说是防空洞,但大多只是一个类似假山的土堆,为了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人们将其内部掏空,以方便周围的老百姓藏身。这些简易防空洞虽然简陋,却在当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洞里没有灯,也没有凳子,仅靠墙一溜用泥垒起了土墩,可供人坐卧。尽管条件艰苦,但人们依然在这里相互扶持,共同扛过艰难时刻。

随着日军飞机对赣州的轰炸愈发频繁,百姓们终日惶恐。当时警报信号按全国统一规定:“空袭警报”为一长声两短声,表示有敌机来袭;“紧急警报”为连续短声,表示敌机已临近上空;“解除警报”为一长声,表示敌机已离去。每次发放警报时间为两分钟。若逢夜深人静,警报声撕裂长空,凄厉之声,使人不寒而栗,至今一些老赣州人每忆及此,犹有“谈虎色变”之感。

轰炸频繁的时候,每天早餐后,大家便提着旅行袋逃往郊外躲避空袭,生活不得安宁。一天半夜,日军飞机轰炸了章贡区灶儿巷的爆竹街。鞭炮被引爆,震耳欲聋;毛巾受热膨胀爆裂,声响比鞭炮还大。更有爆炸引发的大火,使得街道陷入火海,哭喊声、爆炸声交织在一起,居民伤亡惨重,许多店铺被炸毁。那一夜的惨状,让亲历者终生难忘。

这样的惨状并非一例。1942年1月15日,空袭警报突然拉响,街上的人们纷纷四散躲避,只有少数商贩还在抓紧时间做生意。防空防护团全体出动,吹着响亮的哨子,大声催促大家疏散。人们纷纷收摊,蜂拥出城,连建春门的浮桥都差点被踩沉。不久,紧急警报再次响起,敌机的轰鸣声已传到城中心,来不及出城的居民被防空防护团命令就地隐



百姓们躲在简易的防空洞中。(AI制图)

蔽。敌机窜入城区上空后,炸弹如雨般落下,四处爆炸起火。风助火势,火借风威,短短几分钟内,繁华的赣州城瞬间变成一片火海。防空防护团员们在城墙下的水沟里紧急躲避,目睹了28架敌机低空飞行,狂轰滥炸。

敌机飞离后,现场一片惨状,哭喊声、哀号声不绝于耳,到处都是血肉模糊的尸体,惨不忍睹。中山路、中山公园附近,乃至整个城区的许多店铺和银行都被炸毁,化为灰烬。初步统计,这次轰炸,炸死200余人,炸伤300余人,炸毁房屋1000余间,公私财产损失不计其数。这是赣州城遭受最为惨烈的一次轰炸,被称为“血腥的一·一五”。

轰炸过后,防空防护团迅速行动,消防队员和救护队员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医护人员不顾危险,立即展开紧急救援:他们有的抬着担架,将伤员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有的负责现场消毒,为伤员提供初步治疗。与此同时,其他人员也各司其职,抢修被炸毁的道路,扑灭四处蔓延的火焰。

在后方,工人们日夜加班,全力生产棉布、药品等急需物资,为前线的救援工作提供坚实保障。赣县纺织厂更是积极响应,免费为受伤群众提供药棉等急救物资,确保伤员能够得到及时治疗。

次日下午3时,在被炸的废墟上举行了追悼会。会场正中悬挂着一条白布横幅,上面赫然写着“以血还血”,字迹尚未干透,湿漉漉地往下淌着红墨,仿佛鲜血淋漓。会场气氛庄严肃穆,全体干部、各界代表和灾民代表人人臂戴黑纱,胸前佩戴白花。追悼会开始时,乐队奏起了哀乐,接着全体与会人员肃立默哀三分钟,灾民代表已经泣不成声。最后,全场齐声高呼:“要报仇!”“以血还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消灭日本强盗!”

追悼会结束后,各界迅速采取行动,筹办了“一·一五灾民收容所”。收容所设在城区东门光孝寺的一所空房子里,共收容了400多名无家可归的灾民。在收容所里,居民们自发组织起来,互相帮助,共渡难关。收容所不仅为灾民提供食宿、医疗和过冬衣物,还帮助他们解决就业问题,如发放生活救济金、协助复业、介绍工作等。尽管在安置就业方面存在诸多困难,但收容所的设置还是为灾民们提供了短期的庇护,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这种团结互助的精神,在艰难时刻给予了人们温暖和力量。

尽管经历了如此惨烈的空袭和巨大的损失,赣州人民的爱国热情并未消减,反而更加高涨。1940年底,“民国侠女”施剑翘在四川合川县发起“一元献机运动”。短短三个月内,合川便征集到45万元,成功购买了3架战机。合川的成功引发全国轰动,该运动很快推广到整个四川,并迅速席卷全国。

赣州亦随之开展“一元献机运动”。赣州各地都建立了完备的劝募机构,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宣传动员,形成“人为抗战出力”的氛围,赣州各界积极参与,形成献机热潮。不久,赣州各界民众发起了万人签名、义卖及献金慰劳活动。当天商界慷慨献金1390元,各戏院也将一日所得全部捐出,仅赣南电影院就捐赠了251元,还捐赠了216元防务药品。



医护人员不顾危险救援伤者。(AI制图)

同年10月,为将“一元献机运动”持续推进,当局号召大家“节约献机,支援抗战”,赣州各地民众以实际行动践行这一理念,涌现出许多感人至深的事迹。寻乌县私立育英小学师生为支持抗战,集体绝食一日,将节省下来的资金及募捐所得共计26.19元用于购买救国公债。赣县一位姓葛的菜贩,不仅将儿子送去当兵,还将三个月积蓄的三块大洋捐给政府用于购买飞机。

“一县一机运动”是抗战时期“一元献机运动”的继续。据1944年1月不完全统计,江西全省共捐献了86架半飞机,赣州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未有单独统计,但其贡献亦不可忽视。《江西合作金融》(1944年)报道:“南唐湘江、凤岗、潭口、湖头、镜坝、丹材等六蔗塘社为响应献机运动,经捐献飞机一架累计国币二十万元,社会部以各该社深明大义,特特令嘉奖。”

那些艰难的日子,如今早已远去,但《防空歌》的旋律,防空洞里的坚守,还有大家为了献机而拼尽全力的身影,都深深地刻在了赣州的记忆里。那时候的人们,用最质朴的方式,守护着自己的家园,也用最真挚的情感,为抗战出了一份力。这些故事,就像老一辈人讲起的往事,虽然简单,却让人动容。这段历史,就像一本厚重的书,每一页都写满了赣州人民的坚韧和勇敢,也让我们明白,和平的生活是多么珍贵,值得我们用心去珍惜。

瑞金模范师的成立

□钟同福

瑞金模范师,亦称红军瑞金师,于1933年6月25日正式成立。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号召下,瑞金人民积极踊跃参军参战,仅15天时间,便有4000多人加入红军队伍,瑞金模范师由此诞生。它的成立,为中国工农红军注入了一股新生力量,标志着瑞金人民在“红五月”的“扩红”运动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1933年5月,中央苏区各县广泛开展了“红五月突击‘扩红’运动”。瑞金县委响应号召,决定在“红五月”期间组建瑞金模范师。5月22日,召开了全师排以上干部大会,进行紧急动员。会后,瑞金县委组织了4个突击队,分别前往武阳、渡头、九堡、黄安等区开展宣传动员工作,同时,在其他各区也落实了相应的动员措施。“扩红”工作采用宣传动员与教育相结合的方法,从党内到党外,先干部后群众,从模范营、模范赤少队到赤卫军、少先队,层层落实、逐级推进,在群众中掀起了扩大红军的热潮。

自瑞金县委提出组建模范师加入红军的口号后,全县各区积极响应。武阳区召开了区党团员大会,提出了“扩红”工作计划,制订了竞赛条约,要求党团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随后又召开了会议,讨论动员的具体措施,进行全面动员,取得了良好成效。武阳区7个连率先加入红军,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渡头区有6个连,九堡区有5个连,砂心区有一个连加一排,新渡区有一个连,相继加入红军,组建了两个团。从5月30日起,全县五天内集中了20个连又一个排,2000余人。城市区有两个连,踏迹区有两个连,黄柏区有两个连,下肖区有一个连也加入了红军,在此基础上,把6月2日至4日三天内集中的队伍编为第三团。各地在“扩红”运动高潮中,涌现出一批模范“扩红”区。

在这次“扩红”运动中,瑞金人民展现出了高度的革命觉悟和炽热的革命热情。九堡区模范赤少队,在“红五月”有180名队员加入红军。他们深切体会到革命带来的益处。《红色中华》报第83期署名文章《当红军是我们的义务》中提到,瑞金九堡区模范赤少队在“红五月”进行军政训练,每次下操后,区军事部部长都会派人前去指导,少共区委有人前去作政治报告。《纪念“五卅”猛烈扩大红军》报道,武阳区七百多名群众在大会上一同加入红军。《红色中华》报第86期也报道:砂心区在6月1日至4日短短三天内,就动员了一营模范营(人数463名)全体加入瑞金模范师;云集区坪山乡曾来英、谢来发端和谢玉英三位妇女,积极主动动员自己的丈夫参加红军,亲自送到区苏维埃报名……一时间,许多地方出现了“父送子、妻送郎、母亲送儿上战场”的感人场景。《红色中华》报第89期报道,瑞金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优异成绩,瑞金模范师“在最短时间内,已集中了4500多人”,这是瑞金人民响应党中央、中革军委“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号召所取得的显著成效。

1933年6月25日下午3时,瑞金壬田区老虎塘岗上人潮涌动,群众满怀喜悦地在此举行庆祝大会,热烈庆祝瑞金模范师正式成立。新战士4200余人,各区组织的慰问团300多人,壬田、云集、黄柏三区附近六七千名群众参加了大会。各区慰问团的同志还利用会前时间进行宣传动员,鼓励新战士不要牵挂家中,放下思想包袱,一心一意奔赴前线。

会议主席团首先作了关于这次大会意义的报告,中革军委代表、总参谋部第五局局长、动员武装部部长杨岳彬在会上赞扬了瑞金“扩红”成果,阐述了瑞金模范师被编为红军第三师的意义,号召全体新战士努力学习军事、政治,早日开赴前线。瑞金县委、县苏、少共瑞金县委和第三师七、八两团的代表,以及第三师政治部主任都先后在会上发言。

瑞金县委、县苏还赠予瑞金模范师两面鲜艳的锦旗。接过锦旗后,瑞金模范师派代表致答谢词。最后,工农剧社为大会献上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赢得群众阵阵喝彩。庆祝大会直至晚上7时才圆满结束。

瑞金模范师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师,红三师下设第七、第八、第九团。1933年,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前,红军第三师和第十四师在福建建宁附近地区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团。广昌战役后,红九军团执行护送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命令,而后留在福建建宁。1934年9月30日,红九军团率先从福建建宁钟屋村出发,踏上了长征的征途。

李伯钊:红色剧坛放奇花

□李静 袁芳

李伯钊,1911年出生于四川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她自幼聪明伶俐,对新思想有着浓厚的兴趣。后来,李伯钊考入了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在这里,她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并逐渐成长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1931年,李伯钊受组织派遣,赴中央苏区任中央红军学校政治教员。同年12月,《红色中华》报创刊,她成为红中社第一个女编辑、女记者。1933年4月,中央苏区成立“蓝衫剧团”,李伯钊任团长,同时筹建“蓝衫剧团学校”,她创办的蓝衫剧团学校(后更名高尔基戏剧学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所艺术学校,也是我党第一所专业戏剧学校。

执教之余,李伯钊创作了《战斗的夏天》《无论如何要胜利》《工农兵团结》《一起抗日去》等表现苏区军民生活和战斗景象

的话剧、歌剧、活报剧,并带领剧团深入苏区农村和前线阵地开展文艺活动,推动苏区文艺工作和戏剧运动蓬勃发展,鼓舞了红军和群众的斗争意志。

1935年8月,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毛儿盖总结与国民党骑兵作战的经验教训,专门发出《关于对敌骑兵战斗的指示》,加强了打骑兵的战术训练。为此,陆定一和李伯钊合写了一首《打骑兵歌》:“敌人的骑兵不可怕,沉着应战来打他。目标又大又好打,排子枪快放齐射杀。我们瞄准他,我们打垮他!我们消灭他!我们打垮他!无敌的红军是我们。打垮了敌人百万兵,努力再学打骑兵,我们百战要百胜……红色战士们,快练打骑兵。立射!跪射!坐射!卧射!前后左右巧连环,天塌地陷也不乱。”

在毛儿盖,李伯钊还创编了《打骑兵舞》,在舞蹈中运用了

战斗动作的素材,如立射、跪射、坐射、卧射、打排子枪等。由于《打骑兵舞》既有实战的针对性,又体现具体的战术运用,很快在部队中流传开来,成为直接为军事服务的舞蹈,是红军舞蹈在长征路上的创造,体现了红军舞蹈强烈的战斗性。当时红一方面军政治部通知各单位宣传队,都要派人在毛儿盖学习《打骑兵舞》。由于《打骑兵歌》和《打骑兵舞》的推广和普及,战士们不仅获得了战胜敌人的信心,而且在战斗中获得了直接的指导经验。曾任红一方面军战士剧社社长的潘振武回忆道:“《打骑兵歌》及其舞蹈的推广普及,的确发挥了应有的效用。以后红军遇到骑兵,再也不感到惊慌失措了,一排子枪打过去,打得敌人人仰马翻。”后来,红军在甘肃青石嘴、陕北吴起镇等地的战斗中,都成功地运用了打骑兵的战术,取得了战斗的胜利。